

Knowledge Space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知识空间重组 与教育生态重构

温州与欧美、港台地区高等教育
中文教材、文学史知识话语比较研究

孙鹏程 施晓武 杜彬彬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Knowledge Space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知识空间重组 与教育生态重构

温州与欧美、港台地区高等教育
中文教材、文学史知识话语比较研究

孙鹏程 施晓武 杜彬彬◎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空间重组与教育生态重构:温州与欧美、港台地区高等教育中文教材、文学史知识话语比较研究 / 孙鹏程等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308-12143-9

I. ①知… II. ①孙… III. ①高等教育—对外汉语教学—教材—对比研究—世界 IV. ①H1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447 号

知识空间重组与教育生态重构

——温州与欧美、港台地区高等教育中文教材、文学史知识话语比较研究
孙鹏程 施晓武 杜彬彬 等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89 千

版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2143-9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绪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及主要研究方法	(1)
上篇	当下的意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教材写作	(21)
第一节	重构起点:温州地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与文学研究传统	(21)
第二节	大陆范本: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25)
第三节	境外回响:港台模式与英美模式兼具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43)
中篇	理论的自觉:文艺学教程研究	(75)
第一节	大陆样本:《文学理论要略》	(75)
第二节	欧美教程:《批评的视角》	(86)

2 知识空间重组与教育生态重构

第三节	港台话语:《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 等教材特点	(94)
第四节	未来的困惑:最新的文学理论教程 及其书写困境	(107)
下篇	永恒经典与多元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教程与外国文学教材	(137)
第一节	大陆的《中国文学史》与《外国 文学史》研究:人文关怀与方法 探索	(138)
第二节	欧美的汉学研究及其英美文 学研究:对异域的好奇与多元 文化	(172)
第三节	港台的传统中国文学研究与西 洋文学概论:中西学术的细致 探究	(203)
结 语		(231)
参考文献		(233)
索 引		(241)
后 记		(245)

绪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及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一些高等教育学生来说,拿到新发的散发着油印香味的教材及其最初翻看的光景,是打开人生崭新门窗的值得回忆的时刻,不过,教材的意义似乎并不仅限于此,约翰·S.布鲁贝克曾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①这句话多少将教材的意义与分量提高了,看来,教材不仅仅意味着令人温暖的怀旧,

^①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孤立隔绝地对待每个引言,需要将引文放在著作的整个文本中看,这里强调的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不同,强调作为高深的学问对于高等教育的意义,而不是单单指的是教材,但是,这里多少显示出了教材的某种重要位置。

它还多多少少涉及高等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内容。教材作为某种中介,尤其是教学科研的中间环节,会牵涉许多问题。它既涉及高深知识,涉及科研,也涉及教学,涉及科研研究如何转换成面向学生知识的维度。这就使得它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教材适切性问题,随着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目前的教材比起以往的精英教育时代的教材,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它应该比以前有更多的学生意识,应该更注重面向学生,但是,这种学生意识,绝不是意味放弃学术标准。从目前看,这种适切性涉及方方面面:“不管采取什么教学形式,都有必要对学术课程的选择、组织、结构及其内容的逻辑和动机考虑作些深入的分析。让我们先从课程的选择开始,因为学生对课程‘适切性’的呼声之强已使得课程的选择在过去十年中变得特别重要。乍一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教材要进入课程领域必须通过适切性的检验。这种标准的困难在于它过于简单化,只有当人们提出了适切性的对象问题时它的复杂性才显示出来。因此,当人们提出了下列问题,问题就大不相同了:对谁、对什么或多长时间是适切的?适切性的对象是学生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是些实际的社会问题,

还是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善?”^①当然,如果是涉及与社会生产相关的一些教育领域,教材问题可能更加简单一些,但是,在当前时代,一旦涉及具体的高等教育人文社科领域,我们面对的情况可能比以前更加复杂。

在过去,人文高等教育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耶鲁的教授们甚至希望在校中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文学与历史:“他们排除了所有可以在学院之外学习的科目,阻止了所有关于商业、机械制造和农业的学科进入大学——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完全可以在会计室、车间和农场里学习。他们希望大学中强调学习文学与科学,因为这些是学生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永远不会有时间和机会去探求的学问。”^②因此,我们在过去考虑人文社科教材的知识学问题,可能会更加单纯且简单一些,因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高校管理层也好,都有着相对一致的意见。但是,随着高校

① [美]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② [美]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服务社会的思潮的崛起,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氛围多少显得有些低落,此时我们来论述汉语言文学高等教育的教材现状,仍然需要给出既符合人文社科本性,又能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某种定位。

我想,首先,我们还是需要考虑到一些学科的差异,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实际上,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在有的厅堂里,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在另一些厅堂里,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在还有一些厅堂里,一些孤军奋战的思想家是在静寂的图书馆里通过钻研故纸堆来验证他们的思想的。”^①所以,我们在积极投身社会服务的过程的同时,总是需要保持某种追求真理的清醒,需要在热切的服务社会的同时,适度保持某种立场的中立与纯粹。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高等教育多少具有某些不合“时”宜性,某些部分更多地具有一些纯粹象牙塔功能,保持研究某种有限的纯粹性的观点,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强调社会服务功能

^① [美]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的思路并不矛盾,甚至,两者之间可以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

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努力靠近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角度来为我们辩护,我们也需要看到,文学还是有一些独特的功能与作用的。从历史上看,文学语言的教育与研究在社会大发展时期显得特别重要,作为一种母语研究,英语在英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就曾经肩负起了人文精神教育的任务。而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每次社会转型期间,中国语言文学也常常担负着时代号角与精神家园的双重重任。从目前的研究趋势看,不管是在欧美还是中国,文学语言研究常常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最具活力的领域,各种最新的研究方法与实践,都是在母语研究中得到成功实验后,才开始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扩展,从而为各种知识生产提供动力。母语教育作为人文学科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知识传播任务,对我们整个文化生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与著名高等学校对于人文学科的认识有着自己的理解,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对于人文学科的简介就别具一格:“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存在进行学术探讨,同时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素

质。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忙于适应生活方式及自身价值的急剧转变。在这些转变之中,人文学者有责任对自身的历史进行反思,以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带来启示。文学院从香港中文大学创校之始,便以此为已任。”^①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并明确自己的使命:“文学院一直肩负起知识、文化与教育的使命,亦承担着人文学科学者对我们所期望的责任,借以贡献社会。我们订立了独有的教学及研究评估标准,对自身的学术素质及专业充满自信,并有所坚持,亦致力于让学术界及本港社会大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信念。我们将继续为香港、亚洲以至全世界作出贡献,不断造福整个学术界及社会。”^②从这个角度上看,人文科学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此,而我们对人文学院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的适切性的研究维度,将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于其文化传统

① 见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http://www.arts.cuhk.edu.hk/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Itemid=42&lang=zh。

② 见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http://www.arts.cuhk.edu.hk/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Itemid=42&lang=zh。

的母语教育功能、人文社科的思维训练,即“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①与人文关怀维度的追求。当然,需要警惕是,我们是否把某种先在的概念设定为我们的研究起点,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某种僵化的性质,我们是否有可能画地为牢,自己给自己画个圈子自说自话呢?经过反思,尤其是我们在“摸”过了所有我们要去研究的教材,认认真真细读了所有的文本,虚心听取了一些其他专业研究者对我们的看法,了解了目前的教育形势后,我们觉得,我们的这种落脚点,还是符合优秀教材的实际,符合教育对专业的要求的,我们的研究还是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到局部,通过这样的过程建构起来的。当然,从我们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解释学循环,但是,正如我们知道,重要的不是避免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而是如何正确地进入,只要我们保持某种反思,有可能为某种解释的圆满完成提供可能。

本书将温州地区与欧美、港台地区的高等教育中

^① [美]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文教材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考察其内在的知识话语。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高等教育论的相关知识与中文教材、文学史研究相结合,似乎是一项“正当时”的工作,正如陈平原教授在 2012 年所说,“依我浅见,21 世纪人文学各学科,将从‘教育的突破’那里获得很大的收益。除了‘教育学’兼及理论与实践,涉及面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因其目前水平不高,容易取得突破。在与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对接中,教育学有可能突飞猛进,成为下一个‘显学’。面对文学史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诸位若有兴趣翻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或者看看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长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2009 年第 6 期,2010 年第 1 期),当能明白这一点。既然在中文系念书或教书,你就有必要了解古往今来的‘文学教育’,理解‘文学史’这门课程是怎么建立、教师们讲述的各种知识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其

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你我深思”。^① 陈平原先生的某些说法、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异议,但其中对学科交叉本身,尤其是教育学与文学史的交叉研究意义给出了准确、鲜明的肯定。当然,我们在明确我们的使命的同时,也需要知道我们介入这个领域的切入点及我们所能做事情的限制,正如我们所知,诸多高等教育研究论著也已经指出了,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的,我们介入这个领域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知识背景。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高等教育中文教材作为我们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小书标题中的中文是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简称,覆盖这些领域的课程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材、文艺学(文学理论)课程教材、外国文学课程教材等,其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分别对应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中最难处理的是外国文学或曰汉语翻译

^①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3期,第129页。

外国文学部分,这部分的研究,如不提,可能难以体现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如比较,必然涉及一些英语文学的内容。我们最终讨论的结果还是决定将这部分纳入比较范围,但是限制这部分的篇幅。我们的相关比较研究,主要在大陆(由于各地教材大同小异,我们选取了我们熟悉的温州地区)、欧美、港台地区的相同对象的教材中展开,其中主要领域限于我们所提到的四门课的比较——这主要与几位撰写者的知识背景有关。我们几位撰写者所获得的学位正好是涵盖了以上四门课程所要求的知识背景,这将为我们的研究的合理性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撑。

如陈平原所说,在这个领域,正是由于其交叉性,确是正当时,与其他拥挤不堪的领域比起来,先行一步的研究者,是少一些的。从目前看,有以下一些论文与专著值得关注,其中最具参考意义的有温儒敏的《“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法的《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的时空位置——从三本文学理论新著看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等系列学术史回顾论文,胡希东博士的《1950—1980年文学史著作文学

史观念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丁欣的《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温儒敏认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次采用课程的规模和系统(同时又带专著的性质),深入地论评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本为许多大学广泛采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很自然就被视为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界碑。”^①这显然将教材的意义与学科建立的标准联系起来了。温儒敏等人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是前文的一个自然延伸,其中不少章节是关于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的,本书分别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学术生产体制化与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的显学、重写文学史与90年代的学术进路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本书中,文学史写作一直与学科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张法则是该领域另一位有影响的学者,他写过关于这方面的系列文章,对文艺学领域和美学领域的教科书给予了

^① 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新的走向。胡希东博士的《1950—1980 年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观念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是一本思考多年的著述,本书对 1950—1980 年的文学史观念的表述非常到位,体现了深入细致的功夫。丁欣的《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20 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资料详实,系统考察了 20 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不过,这些著作,多是从纵的历史维度做一些研究,很少从一个横的面上展开比较论述,而我们一旦扩大视野,从跨学科的基点出发,从世界文化大视野出发,对我们的教材进行比较,将会发现更多更精彩的东西。鉴于此,我们从以下方法与视角切入对教材进行研究。

(1)高等教育哲学及教育生态学的方法。高等教育除承担社会服务功能,还有保存、传递及继续深入推进高深学问的功能,从而为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提供动力,在高等教育中,复杂的知识生产与传递是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用知识学的方法,将教学、科研视为一种传承与发展的文化活动,教材是一种高深知识的载体,它与相关的学术知识生产系统、社会教育制度、时代精神、民族传承及外